

观史

热血河山寸不让

在抗战烽火中，
山东根据地曾发起合
作社运动，不仅支撑
起了抗战时期的经济
命脉，也为未来的社
会建设埋下了种子——

回望
诸葛合作社



□ 本报记者 卢昱
本报通讯员 龙超

在抗战烽火中，山东根据地曾发起合作社运动。当时的合作社如星火燃起。起初，它是群众眼中的陌生面孔，带着些许理想主义的色彩，但随着减租减息的风潮兴起，随着群众的觉醒，它从消费走向生产，从单一走向多元，农具社、信用社、医药社……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，为人们提供粮食、资金、医疗，甚至文化的滋养。

在1946年1月召开的山东省农林合作会议上，主持人耿光波介绍，据不完整统计，全省合作社共计4448处，共有纺车720735辆，织机106227张。

山东根据地的合作社类型众多，从中心社到联合社，再到生产推进社。这些合作社不仅支撑起了抗战时期的经济命脉，也为未来的社会建设埋下了种子。

解剖一只麻雀，便可窥见一群飞鸟的骨骼与血脉。今天，我们回望沂蒙山区最早的合作社——诸葛合作社的起伏，以期重温抗战烽火中军民同心、一致斗敌的精神。

有钱出钱、有棉出棉

用扁担挑，经营业务量小。后来业务量大了，博山货主就用骡子送货，基本平抑了市场，满足了供应。”马家河北村党支部书记王士友介绍。

当时八路军和党政人员生活条件艰苦，进入冬季，仍然穿着破旧的单衣。区乡政府发动群众开展募棉运动，解决党政军人员的衣着困难。诸葛乡当时所种棉花很少，棉、纱、布均处于奇缺状态，靳玉翰、王金增先是发动群众捐钱，每户从一千两千到三万五万不等（当时流通法币，万元相当于现在一元）。后又组织人力从坦埠买回棉花，加工成熟棉，发动党员干部带头，开展土纺土织。他们到外地请机匠当师傅、请木匠做纺线车，大力宣传，上门动员，很快发展到了十几个村庄。当时群众唱着募棉歌：“秋风起，天气寒，想起战士要衣穿，棉花土布价钱贵，八路军经费有困难，咱们组织募棉会，有钱出钱、有棉出棉，军民同心斗敌顽。”

1940年春天，靳玉翰等人借用了刘家河北刘门章的三间堂屋，办起了纺织社，添置了一部轧花机，一部弹花机，人员也有所增加。纺织社的主要业务是纺织，印染，同时经营生产资料。是年先后有上下华庄、百鼓

峪等村，也办起了纺织社。在纺织社的基础上，1940年12月，正式成立了诸葛合作社，靳玉翰任社长。

1941年春，乍暖还寒。合作社搬进了李家河北村的一处老宅院——合作社会计李洪正的家中。三间堂屋，一间南屋，外加个西棚，成了当时整个合作社的“中枢”。院子里时常堆着棉花、纺车和布匹，脚步匆匆的社员进进出出，或扛着染好的布料，或抱着账本低声交谈。

染坊依旧设在王金增家中，由他的弟弟王金沛负责洗染。可那时，物资紧缺，连最普通的驼黄色染料都成了稀罕物，军衣迟迟无法制成。为了完成任务，合作社发动群众上山摘槐花，搓花粉，一筐筐送进染坊。大缸里泡着的是黄灿灿的槐花水，染出的布料透着淡淡的清香，成了八路军战士身上的军装。

织机声此起彼伏，妇女们坐在炕头纺线，男人们挑着担子往返集市，孩子们也学着大人的模样卷线团。这不仅仅是一场生产自救，更是一场全民参与的抗战行动。土纺织不仅解决了军需民用，也让沉寂的村庄活了起来，老百姓口袋里有了余钱，脸上多了笑容，日子在战乱中悄然复苏。

群众所拥护的区联社

行“坚壁清野”，合作社的轧花机、弹花机未及时转移，被敌人抢去。安家圈纺织组徐金铭将六匹棉布埋在土窖里，因坏人告密，被敌人扒去。在敌伪顽的进攻“围剿”下，北沂蒙仅有的十几个村的抗日根据地也被敌人占领，合作社只得被迫暂时停业。

1942年8月上旬，我鲁中军区发起反顽战役，将国民党五十一军打退。在区委、区政府领导下，停业近一年的合作社又重整旗鼓开办起来，10月，成立了诸葛区联社。在区联社领导下，原来各村の纺织社、组也重新开办起来，并且不断发展壮大，又新建了不少村社。这时的业务仍以纺织业和经营生产资料为主，并开始经营火柴、毛巾等小百货。

1943年，因连年战争和自然灾害造成严重春荒，区联社积极发动群众掀起了纺织高潮。纺线织布按质量好坏支付工价，一等线每斤支付谷子8斤，二等6斤，三等5斤，织一匹布一等工价9000元，二等8000元，三等7000元（当时流通的法币）。以工代赈，帮助群众自力更生，生产救灾，度过荒年。

1944年7月，诸葛区联社第一届社员代表会议在李家河北村召开。会议选出了社长，并选举产生了区联社理事会、监事会。至此，区联社在机构人员方面进一步健全和充实。机构分为业务、会计、运输、油坊、染坊、药股、门市等。

诸葛合作社的建设，在抗日战争中，对打破敌人封锁、克服根据地经济困难、支援生产、解决部队被服、枪支弹药、医疗等问题，以及供应军需民用等方面作出

了积极的贡献，深得当地军民的拥护和支持。如略疃村社1944年3月份在200万元股金基础上办的纺织社，到6月份一结账，每个股金分红6000元。入股社员越来越多，全村百十户人家，只有两户未入股，股金增加到1000多万元。区联社得到了广大群众的信任和支持，股金不断增加，业务经营也逐渐扩大。他们除原来的经营业务之外，还在下华庄、常庄两处村社开办了油坊，在华庄、略疃等村社办起了小酒厂。仅略疃一村，一个冬天生产柿子酒40000多斤。

当时在沂蒙根据地工作的经济学家薛暮桥，一直关注诸葛合作社的发展。1947年，他在华北各解放区财政经济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讲道：“1944年，首先在沂水县诸葛区产生了一个真正由群众自己掌握、且为群众所拥护的区联社。”在《怎样办合作社》一文中，薛暮桥指出：“只要群众生产上和生活上有困难，合作社就应当想法替他们来解决。至于解决办法，可由群众自己商量。许多事实说明群众自己商量出来的办法，往往比某些干部主观想出来的办法高明万倍。”

而今，合作社的精神在诸葛镇开花结果。当地综合考量历史文化、自然景观、产业布局、红色资源等要素，将全镇100个自然村划分为“陌上花开”“钛向未来”“果乡沂河”3个片区，通过连片规划、连片投入、连片共建、连片发展，将各村资源有效整合、优化重组、科学配置。“我们鼓励引导各村立足农业传统优势，成立党支部领办创办合作社，发展特色林果、经济农作物种植产业，让村村有产业、户户有收入。”诸葛镇党委书记刘涛说。

喊出自己的声音

——高考作文题随想

□ 逢春阶

赋予了记者的胆识，催生出记者的激情，成就了记者对人民的忠诚。世上之声，无不有情。老何的作品，言的是民情、喊的是民声，因为出身农家、泡在基层的他有着与民同髓的血缘。

老何现在年纪大了，基本不写了，但他一直关注新闻，关注年轻人，每次碰到他，他都嘱咐我，要好好写。我很感动。

张炜的短篇小说《声音》很短，但寓意深刻。作品以改革开放初期的山东乡村为背景，通过少女二兰子与残疾青年“小罗锅”的林中相遇，讲述了一个关于自我觉醒与生命价值的故事。19岁的农村少女二兰子，辍学后每日清晨需到芦青河畔的密林深处割牛草。二兰子在寂静的林间一时兴起，高喊“大刀味——小刀味——”，意外听到河对岸传来回应：“大姑娘味——小姑娘味——”。嫩气的男声令她误以为对方是俊朗青年，既羞怯又好奇。二兰子按捺不住跨河寻人，却发现回应者竟是个“和弯榆树差不多”的罗锅青年。她大失所望，却目睹他割草时动作麻利，休息时专注研读外语。交谈中，“小罗锅”直言二兰子“活灵灵十九岁，怎能认命割草”，并痛斥她的自我贬低：“你嗓子能唱戏，手能编草马，怎会不

行？”一席话触动了二兰子，她失声痛哭。“小罗锅”以林中风声、鸟鸣为喻，鼓励她：“我们不该给林子添一种声音吗？人该喊出自己的嗓子！”二兰子首次思考自身价值，内心萌生改变的動力。

《声音》获得1982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，被誉为“童话般的哲理诗”。张炜以细腻笔触揭示：真正的“声音”无关噪音响亮，而是灵魂拒绝沉默的勇气——无论身陷草莽或困于残疾，生命的光辉终将在自省与呐喊中迸发。

回到今年高考作文题，提供的材料是老舍在《鼓书艺人》中的话：他想要给孩子们唱上一段，可是心里直翻腾，开不了口。艾青在《我爱这土地》中的诗句：假如我是一只鸟，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。穆旦在《赞美》中的诗句：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，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。“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？请写一篇文章。”三个材料，都写于抗战时期，今年是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，围绕弘扬民族精神写，不会跑题。当然我们也可以发散思维，比如写到声音——喊出自己的声音。

若干年前，我在山里住了一年，早晨有好

多人爬山展练，我也起来爬。天空灰蒙蒙的，不规则的石街也变得模模糊糊。深一脚浅一脚地往上攀，猛不丁，就从黑影那儿蹦出一声吼，起初我直想笑。再登上几级，另一个黑影就发出别一个声音，尖尖的，像换大来的吆喝。远远的，山那边就有一个女人的应答声，也是尖尖的。我心中隐隐地也有了吼一嗓子的欲望，但却鼓不起喊的勇气，生怕被人看见笑话。我加快了步子，转弯、直上、再转弯，身子靠住一棵一握粗的老槐树，四下里瞅瞅，没人；再瞅瞅，还没人。壮着胆子，把搓热的手贴在嘴边，仰起脸，冲天呐喊：“嗽——嗽——”回声清晰地送过来，我终于无拘无束地喊出来了。喊出自己的声音，原来如此简单。

高考作文题，还让我想起艾青《吹号者》的题记：“好像曾经听到人家说过，吹号者的命运是悲苦的，当他用自己的呼吸摩擦了号角的铜皮使号角发出声响的时候，常常有细到看不见的血丝，随着号声飞出来……”细到看不见的血丝，随着号声飞出来，这样的声音是悲壮的、高亢的、心血所凝的，更是神圣的、庄严的。

今年高考作文题出得不孬，能引发联想。我为之点赞。

火锅史话



□ 汪霏霏

火锅，不仅是美食，更是一种文化，承载着千年的历史与变迁。如今火锅在海外也逐渐占据潮流美食的一席之地。各种新颖的火锅形式，很能代表中国人对食物的创新精神。

火锅的源头目前还没有公认的结论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火锅的发展亦如餐饮史的发展是渐进式的，完全是依据当时的器皿、社会的需求与原物料的发现引进而变化的。浙江等地曾出土5000多年前与陶釜配套使用的小陶灶，可以很方便地移动，算是火锅初级形式。北京延庆县龙庆峡山戎文化遗址出土的春秋时期青铜火锅，有加热过的痕迹。到西周时代，不但发明了铜与铁，且各种陶器也改良制作成较为小型的器皿，适合一般人使用。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，汉代出现一种叫作“染炉”“染杯”的小铜器，大概就是古代单人使用的小火锅。三国时代，魏文帝曹丕，在铜炉中嵌入隔板，实现“一锅五吃”，这就是“五熟釜”，所谓的五熟釜，其实就是分有几格的锅，和现在的“鸳鸯锅”有点儿像。很多人认为这两种锅就是火锅的雏形。这两种锅虽然跟今天的火锅长得像，但火锅之所以叫火锅，核心并不是锅，而是要涮着吃，文献里虽然夸赞这两种锅使用方便，但并没有提它们的用法和其他锅有什么不同。

在整个火锅历史的演变中，描写火锅最为传神的是南宋士大夫林洪所著《山家清供》里的“涮兔肉片”。当时，林洪前往武夷山拜访隐士止止师，快到山峰时，天空下起大雪，一只野兔滚下山来，被林洪抓到，他想烤来吃，问止止师会不会烧兔肉，止止师回答他说：“我在山中吃兔子是这样的，在桌上放个生炭的小火炉，炉上架个汤锅，把兔肉切成薄片，用酒、酱、椒做成调味汁，等汤开了夹着肉片在汤中涮熟，蘸着调味料吃。”用这样涮熟之吃法，林洪觉得兔肉甚为鲜美，为此种吃法取了个“拨霞供”的美名。这也成了涮肉首次有文字记载的一种说法。

另外一种涮肉起源说，来自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军。蒙古骑兵的粮食都是牛羊肉，被称为“会走的粮食”，这也大大省去了运送粮草的时间。但是用大锅烹任大块牛羊肉，要浪费很多时间，蒙古骑兵的行军速度就这样被束缚住了，后来成吉思汗发明了一种新吃法，他命令士兵用自己的头盔当锅，再把牛羊肉切成小片涮着吃。这可是划时代的创新，不仅解除了束缚行军速度的封印，还让大批厨子放下了铁锅拿起了马刀。不管怎样，北派涮肉火锅就这样横空出世，相较于之前的“煮”，“涮”这种吃法让食材更加鲜嫩爽口。

宋代虽然有了跟今天火锅类似的吃法，但流传不广。在明代，几乎没有相关记载，可见并没有普及开来。真正推广火锅的是清代皇室。“火锅”这两个字，很可能是从清宫里传出来的。据《考吃》记载，火锅有“生火锅”与“野意火锅”。相传清朝康熙皇帝到吉林一带微服私访，一农户请他吃饭，只放一个炭火盆，盆上放一个铜勺，勺内有肉、蘑菇与白菜。康熙吃得 very 香，便问菜名，主人随口答道：“炭火锅”。今日北方的涮肉，原名实为“野意火锅”，是随清兵入关而传入中原的。据《奉天通志》记载，野意火锅的食法是：火锅（以锡为之，分上下层，高不及尺，中以红铜为火筒着炭，沸汤时，煮一切肉脯、鸡、鱼，其味无不鲜美。”火锅在清朝不仅盛行民间，而且成了一道著名的“宫廷菜”，清宫御膳食谱上有“野味火锅”，用料是山雉等野味。在康熙皇帝“千叟宴”的一份菜单中，有一道“野味火锅”，具体内容是：“随上围碟十二品——鹿肉片、飞龙脯、孢子脊、山鸡片、野猪肉、野鸭脯、鱿鱼卷、鲜鱼肉、刺龙牙、大叶芹、刺五加、鲜豆苗。”乾隆皇帝更是举办过有近1650只火锅的火锅宴。在清宫御膳档案里，野味火锅、生肉火锅、羊肉火锅、菊花火锅都经常出现。

上有所好，下必效焉，加上火锅本身特有的魅力，很快在北京城火热起来，影响力随即辐射全国。

时至今日，由于地域差异和所涮食材的不同，我国已形成许多特色火锅，北京火锅，河南的铜火锅，江浙一带的暖锅，广东的粤式海鲜火锅等。其中比较有名的广东海鲜火锅、山东肥牛小火锅、北京羊肉涮锅、江浙菊花暖锅，与重庆麻辣火锅被称为“中国五大火锅”。四川“毛肚火锅”主要是吃牛肚及内脏，重庆的正宗“毛肚”，麻辣醇香，名扬天下；广东的海鲜火锅，食而不腻，味美无穷，广东人称火锅为“打边炉”，所用的筷子也特别长，比普通筷子长一倍；北京的羊肉涮锅风味别致，以北京的天福楼、普云楼等老字号最为著名。此外，杭州的“三鲜火锅”、江浙的“菊花火锅”、湖北的“野味火锅”、东北的“白肉火锅”、香港的“牛肉火锅”、上海的“什锦火锅”等，也风味别具，堪称寒冬里的“席上春风”，为食客们津津乐道。

中国的饮食文化脉络万千，大概只有火锅，能拥五湖四海之共同热爱，一锅同煮不同的故事，好像没有什么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。它作为中国人的独创美食，既任性又有着最深度的包容。

（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）

